

唐代文学研究

識小集

阎琦 著

李勉題



鷄鳴紫陌曙光寒
鶯囀皇州春色闌
全闕曉曉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宮
花迎劍佩星初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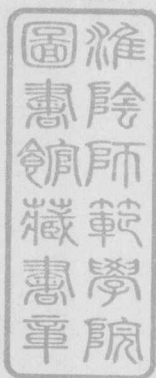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1515197

唐代文学研究

识小集

阎琦 著



本书为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15197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识小集/阎琦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6
ISBN 978 - 7 - 80736 - 958 - 5

I. ①识… II. ①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文集 IV. ① I 20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0590 号

识小集

	阎琦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230mm × 165mm	
印 张	29.75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36 - 958 - 5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识小集》序

薛天纬

友人阎琦将三十余年所写的论文结集出版，嘱我为序。犹豫再三，一则却之不恭，二则不能辜负他对我的真诚信任，因欣然为之。我读了他自己写的跋语，这篇序或可视为“跋”的补充。

我痴长阎琦一岁。“文革”前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是先后同学，“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我与他同时考回西大，师从傅庚生、安旗二位先生，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从1978年秋至1981年底，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是真正的同窗了。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我“二出阳关”，返回刚刚成立的新疆师大。空间距离相隔很远了，但彼此间的感情联系却转而更加紧密，三十年如一日，这份感情历久而弥新。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真说不清。客观上，我们仍然有许多相聚、交流及共事的机会，比如，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起参加安旗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项目，曾有相当多的时间在一起工作。但更根本的，应是彼此在主观上有投合之处，古语曰“惺惺相惜”，排除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倒觉得与他的情分真是这么一回事。相惜，则必相知，既知其文复知其人，而文如其人，试从其文说起。

阎琦的学术研究，如其《跋语》所说，“以唐代文学和唐代文献整理为主”（以下引他的话，除另注明者外，均出《跋语》），就中又以韩愈和李白的研究为重点。其代表性成果，当然有分量颇重的专门著作，关于韩愈的，有研究生始毕业即出版的硕士论文《韩诗论稿》，有前些年出版的上下两巨册《韩昌黎文集注释》，关于李白的，有合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等。然而，专著涉及面广，可能反不如单篇论文更能反映他的学术个性。阎琦为学，坚持的原则是“说自己的

话，勿步他人后尘”。这一原则实为学术研究应秉持的通则，然与人的性格、思维特征及文风结合起来时，乃可形成学术个性。阎琦的研究是很有个性的，他惯于细味深参作品文本，于覃思精虑中发现问题，小心求证，如入武陵源中，一步步地探索，一步步地前行，终于到达“豁然开朗”之境，形成自己的“真知、新见”。他谨慎而谦虚地自谓“识小”，其实是大小俱有所得，试举例言之：

他于研究生一年级时即在西大学报上发表的学术处女作《李商隐“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解——谈谈李商隐就婚王氏前的几首诗》，曾使同窗的我等艳羨。我当时的感觉，首先是文章的题目新颖，像一句长而且结构复杂的话。文章着眼的直接对象具体而微，但确实把诗人在特定时期所写的那几首诗读透了，其结论“受感情上的大势所趋迫，使严于情而又多于情的诗人非赴泾原不可，并非因牛党无所托而转托于李党”也就令人信服。史书对李商隐人格颇多贬抑，谓其“背恩”、“诡薄无行”、“放利偷和”，此文推翻了这一定谳，实具有因小及大的性质。由这篇文章可见作者文心之深邃细密，其学术个性已见端倪。还有，就是文章的语言，我的记忆中，见多识广、爱惜人才的郭琦校长针对这篇文章曾说过“想不到阎琦的语言这样老练”之类褒奖的话。须知作为一年级研究生的我们，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尚处于入门阶段，对于“专业语言”也才处于习得过程中，而阎琦似先已登堂入室！话说到这里，不免心生惭愧，1980年，我也在西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由于此文过于稚嫩，后来，我在编论文集时放弃了它，而阎琦的文章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失其学术价值。

严格意义上的“识小”，是《〈与元九书〉“之无”小考》这篇数百字的小文。许多年前在闲谈中，阎琦就给我说起过对“之无”的思考，我听了深表赞同。2005年，复旦大学陈允吉先生要编荣休纪念文集，向朋友们约稿，他遂把酝酿多年的想法写成这篇文章，派上了合适的用场。文章小则小矣，但论证过程和结论却给人很多启示，我相信是解决了白居易研究中一个被人忽略的疑难问题。

《识小集》中关于李白、杜甫的论文，涉及两位大诗人生平的重大问题，在我看来，实为作者的重要学术贡献，故不能不予以特殊关注：

检视目录，不难发现，以杜甫为题的文章仅有《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一篇（以下简称《考论》），这可能是作者至今研究杜甫的唯一正式成果，虽不“累累”，却是一枚“硕果”。诚如《考论》所说，杜甫之诗被称为“诗史”，“含义有两端：一、诗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二、诗中所反映的杜甫个人生活经历之史。……杜甫诗，尤其是安史乱后之诗，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诗人个人生活大多历历可考，对于杜诗编年以及杜甫行踪等，研究界虽小有歧说，其大端多倾向一致，甚少歧见。”然而，就在这“一致”之中，形成了一个盲点，即信从自《新唐书》以来的华州“弃官”之说（《考论》指出，《新唐书》之说又“源于王洙的《杜工部集记》”）。“弃官”说的破绽其实显而易见，平心而论，我自己在“潜思维”中未尝没有怀疑过：任凭杜甫在华州司功任上不顺心到何种程度，他有什么必要置全家生计于不顾，轻率做出“弃官”的决定，挈妇将雏西入秦州，以致把全家人拖入生活的绝境？我相信与我一样抱有这种疑问的同行，恐不在少数，只是绝少有人深究。《考论》说，“陋见所及，惟一的例外是胡适先生，其《白话文学史》二编十四章《杜甫》说：‘依上引《立秋后题》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惜未作申论。”依着胡适的指点重读《立秋后题》，我们不能不惊异于此前读诗的草率，杜甫分明自道“罢官亦由人”（“由人”是无可奈何之语），何以古往今来的论者都对“罢官”二字视若无睹，而人云亦云地重复着“弃官”的说法，甚至还要花许多心思多方探究杜甫“弃官”的原因？我不禁想起杜甫《戏为六绝句》所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杜甫身后，过了一千二百多年，胡适第一次发现了诗人自道“罢官”；从《白话文学史》出版的1928年到2002年，又过了七十五年，阎琦才第一个回应胡适，并对他的看法做了申论。《考论》以极其细密的针线考索了杜甫自“乾元元年（758）六月坐房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至乾元二年七月作《立秋后题》这一时期的诗作及行迹，探得杜甫罢官的原因是“与他在华州任上过于荒怠政务并触犯职律有关”。这篇论文2002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杜甫与唐宋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曾引起广泛关注，论者谓其“在彰表杜甫其人其事其文时，并不为贤者讳，而是

站在新世纪学术研究的高度，回归更客观的观察与分析”，甚至认为它能“重返‘现场’”（毛正天《新视野 新观念 新方法 新会风——杜甫与唐宋诗学学术研讨会观察报告》）。“重返‘现场’”，即对历史事实的复原，亦即肯定阎琦之文道出了杜甫“罢官”的原因。应该说，在目前人们所能掌握的史料前提下，《考论》是对这一问题最合理的回答。

阎琦在李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识小集》中《李白卒年刍议》（以下简称《刍议》）、《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以下简称《再论》）二文对李白卒年的考证及广德元年（763）说的提出。《刍议》发表于1985年，《再论》发表于2000年，其间相隔15年，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执着及用功之深。关于李白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的传统说法，是凭借了李阳冰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的《草堂集序》中“疾亟”一语。质疑传统说法的研究者，前已发表过对“疾亟”含义的商榷，阎琦的两篇文章则是对“疾亟”之前和之后李白相关作品及历史事件进行系统考察，从而确定“疾亟”并非病逝。在此过程中，多有重要发见。就史料而论，比如，征引肃宗上元二年《授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以制文中“剿彼绿林之盗”语证明李光弼除征伐史思明叛军外，确实负有征讨袁晁的使命，而袁晁势盛在宝应元年八月，则李光弼“出征东南”及李白从军未果均应发生在宝应元年秋。又比如，征引《新唐书·代宗纪》“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的记载，由此判定李白在身后“被召为左拾遗，即在此时”，“谏官”与“左拾遗”在这里合若符契。以上两条史料都十分有助于确立李白卒于广德元年这一判断。更有说服力的，是在李白诗作中发现内证，兹举《游谢氏山亭》一例，诗开首写道：“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再论》曰：“‘再欢天地清’当指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势穷自缢死事，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宣告结束。”我十分赞同这种解说。“再欢天地清”，其实是“欢天地再清”的意思。这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写实的，诗将抒情融会于叙事之中，抒写了久病初起的诗人迎来又一个春天时的欣喜之情。诗的开头四句可散绎为：“我在迟暮之年，寄身于远离

朝廷的地方，想不到还能亲眼看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大唐天下又回到太平岁月，真是令人欢欣不已。自从去年冬天那场几乎要了命的大病以来，我长期困于病榻，在寂寞中打发时光，今天才第一次走到户外，看到岁物更新的景象，真觉得辜负了这大好春光。”散绎的话语，根据读诗的语感，对诗句作了必要的填充。经验告诉我们，读古诗文的“语感”，对于理解语意至为重要，“语感”往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而却最可靠。有论者认为“再欢天地清”不过是一般颂美之语，恐怕正是在“语感”上有隔。此诗既没有地方官之类的颂美对象，也不是以“海晏河清”一类话来颂美朝廷，而是单纯抒发诗人自己内心深处的庆幸感和轻松感。《再论》还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诗末‘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二句，‘稚子’当然不可能是伯禽，而是伯禽之子。当广德元年，伯禽已有二十五、六岁，是已娶的年龄，他的儿子已懂得迎接晚归的爷爷了。伯禽之子在当涂，说明伯禽遵父之命，已举家南迁，且定居当涂，准备长远侍奉于父侧了。”扣住“稚子”二字生发出这段话，由此判断李白“疾亟”而并未病逝，逻辑很严密，如果李白宝应元年即逝，伯禽是来不及举家南迁的。《再论》又引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为“李白病体复苏的旁证”，并就诗题考曰：“杜甫自天宝初与李白别后，所写关于李白的诗，都是在不知李白确切地址、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写的，诗题或曰‘怀’（如《天末怀李白》），或曰‘梦’（如《梦李白二首》），或径题曰‘不见’，唯独此首曰‘寄’，可知是在得知李白确切地址、对李白近况有了准确了解且李白有了相对稳定居住之地以后写的。”《再论》细绎杜诗“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二句，曰：“此二句句法同于杜甫《春日怀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前句写自己，后句写李白，而且，‘病起暮江滨’明明是说李白已经‘病起’，说明杜甫听到的不止是李白病发当涂的消息，听到的还有李白病发之后经疗养已经‘病起’的消息。假若李白病体复苏在来年春天，则时间已在半年左右，宜乎远在成都、梓州的杜甫能得知李白的消息并‘寄’诗给李白表示他的慰问了。”我这里之所以做成段的征引，是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示《考论》作者“精细入毫发”的文思和文风，所谓“读书得间”，此其一例乎？当初我们在安旗先生带领下进

行《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的工作，曾认真讨论了《刍议》关于李白卒年的考证成果，决定采用这一新说。此后又有《再论》的进一步深入考证，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已基本成熟。2007年夏，在中国李白研究会湘潭会议上，我受学会委托，作《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20周年学术总结报告》，将阎琦关于李白卒年的新说做了重点推介。我在那个报告中讲到近三十年来“李白生平事迹研究”方面的成果，列举了七项，阎琦关于李白卒年的考证为其中之一。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阎琦的结论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识小集》载入大小文章凡50篇，三十年间写成，年均不到两篇，就数量而论，不算多产。这首先是因为阎琦做文章坚持要有“真知、新见”，同时，在我看来，也与他为人行事的“低调”有关。他平日只是从容做事而不事张扬，他甚至很鄙弃那种“张扬”的作派。但他又是很自信的，每做成一件事，做得满意了，也会有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读他的《跋》，不难感受到这一点。退休以来，他常常说“今后什么都不干了”一类话，似乎真如跋语所说要退出“人生的竞技场”，但其实并没有闲下来。近些年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主编了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编（隋唐五代部分），作为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配套教材，有周期地印刷，发行量十分可观。做成这件事，于“沾溉后学”自然是不小的“功德”，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精神满足、包括每年都能得到一笔不菲的版税（“不菲”的标准，当然是对我们这个阶层而言）。他曾对我说：“想起来当年我们编李白编年集，辛苦数年，最终仅得到一千元左右的稿酬！”此中感慨，我自能理解。在阎琦身上，很能体现读书人的传统品格：一方面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与世俗拉开一定距离，在做人上保持几分清高。当今年月，社会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很茫然，但如我辈者，在衣食无虞的前提下，既能为社会做点事，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我以为就很不错了。他因为对政治淡漠、远离“组织”，被认为是清高自负，连共青团的门槛都没迈进；平日评论时事，月旦人物，颇有些魏晋名士风度。一件很巧合的事情是，就在他被宣布退休一个月后，却被省政府聘为参事。既为省

参事，当然算得上“长安名士”了；但他参加了参事的一段活动，又说“乏味”，没有多大意思，活动也不好好参加了。所谓“参事”，其实无多少事可参，宜其清高如故。阎琦亦能诗，能作联语，西安大唐芙蓉园西门（正门）联语“炎汉宜春苑曲水千载相如赋中皇家气象；大唐芙蓉园柳烟三春唐人诗裏帝里风光”即出自其手。诗，所作多为七绝，但轻易不为，我所读到的两组七绝，都是悼人之作，其中有悼念英年早逝的同窗李云逸君的一首，见于本集之《中文系忆旧》，可知阎琦非到情绪不可遏抑时绝不写无谓之“诗”，他是很重感情的。

阎琦告我，我们的另一位研究生同窗费秉勋答应为他题签。秉勋是西安著名书法家，是另一风度的“长安名士”。我应命为《识小集》作序，吾辈得成三位一体，不亦美事乎？序成，于心实欣欣然、亦戚戚焉！

辛卯元日于京东八里桥寓所

目 录

新千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展望	(1)
20 世纪 80 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10)
长安:唐代诗坛的中心	(19)
说闻一多“诗唐”说	(39)
中国古代散文和《古文观止》	(51)
关于李白的户籍、婚姻及科举的余论	(67)
李白在安陆、东鲁的亲族臆考	(74)
李白家室述证	(82)
李白的人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95)
李白入越考	(109)
李白卒年刍议	(121)
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	(134)
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漫议	(142)
李白与三峡	(148)
简论李白乐府旧题诗	(157)
“盛唐气象”与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漫议	(165)
李白诗歌与比兴传统	(181)
读《李白集》丛札	(187)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后记	(197)
--------------------	-------

韩愈籍贯、郡望考	(204)
----------------	-------

关于韩愈的生母	(211)
---------------	-------

韩愈的“阳山之贬”析	(215)
------------------	-------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226)
---------------------	-------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239)
----------------------	-------

韩愈“服硫黄”考论	(253)
-----------------	-------

说《韩集》的几篇佚文	(264)
------------------	-------

《韩昌黎集》“外集”及“遗文”考辨	(273)
-------------------------	-------

试论韩愈的人生价值取向	
-------------------	--

——从几篇韩愈少作谈起	(282)
-------------------	-------

韩诗的议论和以议论为诗	(288)
-------------------	-------

《韩昌黎文集注释》后记	(294)
-------------------	-------

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	(305)
--------------------	-------

唐诗中的长安侠少和“恶少”	(317)
---------------------	-------

李翱生平及其古文写作	(329)
------------------	-------

李商隐“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解	
------------------------------	--

——谈谈李商隐就婚王氏前的几首诗	(371)
------------------------	-------

《锦瑟》新解	(378)
--------------	-------

史的卓识和诗的“弁冕”	
-------------------	--

——简论李商隐《韩碑》	(385)
-------------------	-------

新罗诗人崔致远	(397)
---------------	-------

崔致远佚诗笺证	(407)
---------------	-------

古诗的割裂手法	(416)
《与元九书》“之无”小考	(420)
卢仝生年质疑	(421)
序、跋、学人杂忆	
长安雨洗新秋出 ——贾三强《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志)著录 文集研究》序	(424)
唐诗长安场景的回放	
——匡燮《唐诗里的长安风情》序	(427)
与李元鼎先生的旷世诗缘	
——《李元鼎诗文墨迹散拾》代序	(429)
无怨无悔的奉献 卓有成效的工作	
——记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	(436)
中文系忆旧	(441)
一、傅庚生先生	(441)
二、刘持生先生	(444)
三、张宣先生	(447)
四、吴天惠先生	(451)
五、蒙万夫先生	(453)
六、李云逸君	(456)
跋语	(460)

新千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展望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永恒活力的部分，曾对整个东方文明及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大约从1997、1998年起，中国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就已经开始对本学科百年以来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1997年8月，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委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召开了以“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为题的会议；九八年十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也召开了旨在总结本学科百年研究现状的会议。哈尔滨会议的主要论文，结集为《百年学科沉思录》^①出版，贵阳会议的论文及讨论发言，分别刊载于《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九九年号上。其他古代文学的学科，或作家作品，也有总结性的文章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已经出版的《李商隐研究论集》（1949—1997）和将要出版的《李白研究百年论文精选》^②，则是由李商隐研究会、李白研究会对各学科研究的论文汇集。

因为时间较为贴近，空间的距离也未拉开，就目前总结和反思看，总结的成分最多，内省次之，前瞻又次之。随着新千年的切实的临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内省的文章渐次多起来了，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成绩面前的危机感和对新千年研究前景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釜山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召开此次旨在展望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会议，便显得非常及时。

以下我着重谈四个方面的问题。敬请与会诸位先生指正。

① 《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商隐研究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白研究百年论文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千年展望之一：

纷纭研究方法的清理和认定

关于研究方法，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变化。本世纪初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物件以经学为主，与经学相表里的文字、音韵、训诂等也是学者们主要研究物件。研究方法，则是后世称为“朴学”的乾嘉学派的方法为主流。“朴学”注重实证，曾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因其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未免支离破碎、单一死板。本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型学者取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显出蓬勃生机。20至40年代，一批中西兼通的学者不断涌现（如胡适、闻一多、陈寅恪等），两方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包括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等，被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在一些学者那里（如鲁迅、郭沫若、刘大杰等）得到良好的运用。可以说，本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那个时代被称为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研究成绩举世瞩目。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片面强调的唯物史观蜕化成为庸俗社会学，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的来看是停滞的。80年代伊始，“改革开放”被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元化格局被打破，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回归于其科学的、良性的一面，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再一次被研究者广泛使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80年代中期，随著现代西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大量涌入，一批学者（主要是一批年轻学者）为了创新，完全或部分摒弃了为多数学者惯用的研究方法，运用所谓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些方法包括了：心理学研究法，原型批评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结构主义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甚至原属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资讯理论（即“新三论”），也被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新方法的引入，其初衷是为了扩大研究视野，开拓研究领域。事实上，新方法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许多新方法的操作者，其基础是薄弱的，又难免心浮气躁；受外语水平的限

制，他们可以说连这些新方法的真正含义尚未弄清，便生搬硬套地加以动用。所以，新方法研究的效果基本上是不良的，主要表现在：

一、所谓新方法研究的成果，往往只见新名词、新概念的搬弄，一个极简单明了的事实，在他们手里，变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

二、所谓新方法研究的成果，引起了学术术语的混乱，造成了无法交流的现象，即是说，一些新方法的论著、论文，变成了多数读者及研究者无法顺畅阅读的“天书”；

三、与以上相应的，是一些怪异的研究结论的产生，例如有人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母亲只是恋子情节的精神病患者而已等。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新方法”遭到古代文学研究界多数人的抵制，喧嚣一时的“新方法热”于90年代初便基本歇止。徐公持对“新方法”的产生及消歇，是这样总结的：

“新三论”（系统论、资讯理论、控制论）本是自然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一些识者将它们介绍进来，甚至还有人尝试着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能开人眼界，诚所谓多闻多益。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新三论”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得轰动效应，但其后便难以为继，不久便销声匿迹，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学科性质物件都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欲沟通两类距离遥远的学科，尚须下更大更多的功夫；主观上则论者不具备打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术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论，不亦难乎①！

徐先生的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

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新方法”热的骚动，可以预见到新千年的中

① 徐公持：《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见《百年学科沉思录》一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方法上，将保持一种更稳定的、更成熟的心态，也就是说，将对纷纭的研究方法自省式地进行清理和认定，保持整齐、稳定、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思维方式。在此前提下吸纳多种研究方法。而传统的注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中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这种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奠定其基础的是清乾嘉学派，经当代学者陈寅恪丰富发展，遂成为一种既重实证、又重文史结合的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证诗”。长期的学术实践证明，由乾嘉学派开创、经陈寅恪等丰富发展的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是最具有学术内涵、学术成果最具恒久生命力的方法，也最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相适应。这是一条传统的方法，却也是一条无止境的方法。它又极具包容性，但凡人文学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皆可以包容在内而不相悖。近五十年中国古代文学有价值的研究，俱是成功运用此种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近十数年也有发展，那就是程千帆所倡导的两个“结合”的研究方法，即文史结合，文学评论与文学鉴赏，史料考订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千年展望之二：

关于文学的研究与研究的文学

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始终未能摆脱仅仅作经学附庸的地位。真正将研究的物件确定为文学（诗、词、曲、赋、散文及小说等），是本世纪初的事。本世纪20至40年代，因一大批才学兼长的研究者的出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如百花竞放：如胡适之于中国文学史、《红楼梦》，鲁迅之于中国小说史、魏晋文学风貌，闻一多之于《诗经》、唐诗，郭沫若之于《楚辞》和屈原。我们之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的研究是百花竞放式的，原因即在于他们研究的物件是文学的，研究的手段和叙述的语言也是文学的：皆能以抒情的目光解析文学，复能以抒情的文字再现古代文学的魅力。例如关于《诗经》，胡适说：

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有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两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总结算。宋人驳倒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了汉人。至今《诗